

## 專題研究

# 臺灣本土化論述的當代緣起

石之瑜

## 摘要

本土化發生在臺灣，是在文明衝突作為論述之前；本土化的觀念也出現於臺灣社會科學界對方法論進行反思之前，則又可見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其政治社會的背景。本文探討何以本土化的訴求沒有溯及紅葉少棒隊，說明本土化的緣起同時有巧合與意識兩方面的原因。這兩方面的原因不同於較長遠的歷史結構，也不同于因應當代局勢的政治需要而已。1990年往回推二十年的歷史發展，事後看起來應當是能讓臺灣成為中國之外獨立個體的重要根源。其中，美國政界在越戰之後對世界格局進行觀念上的變動，以及美國學術界因應依賴理論而到東亞找靈感，使臺灣在大陸之外的獨立地位取得新的意義，可以作為本土化的主體意識起源；而大陸在文革後自我定位的變遷，則有助於臺灣本土化論述獲得新的對象。

關鍵詞：文明衝突、本土化、紅葉少棒、太平洋盆地、依賴理論、文化大革命、第三世界

## 壹、文明衝突論述之前的本土化機緣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提出至今有超過十年的歷史了<sup>1</sup>，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這個主張特別引人注目，因為世界各地的確發生許多基於群體間相互仇恨的流血事件。故從文明衝突的推論出發，世界各地紛紛開始強調本土化也就不足為奇。但本土化是不是因為文明衝突的世界趨勢而發生的呢？或是各種本土化的訴求有其自己的歷史脈絡，也因此本土化不能等同於對外衝突？這個問題目前也正困擾臺灣的政治發展，因為本土化的訴求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降的政壇上，似乎確實是伴

<sup>1</sup>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1993): 22-49.

隨著大陸政策中的衝突傾向<sup>2</sup>，同樣的本土化訴求在學術研究上也產生影響，有時是標誌著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抗拒<sup>3</sup>，也有時是標誌著有關中國人行為研究方法上的反思<sup>4</sup>。

文明衝突論一向是站在基督教文明的立場來看這個世界，希望理解當今世界為什麼會出現基督教文明推廣的瓶頸，除了試圖作出解釋，並進行預測。身在臺灣的人當然也感同身受。在冷戰結束之後，國際局勢大幅轉變，蘇東波結束了社會主義集團，中共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也經歷體質性的變遷，整個大陸逐步開放，同時，臺灣的國家體制經過政治上翻天覆地的改革。短短十年間有很多變化紛紛發生，其中唯一不變的，似乎就是基督教文明的自身。這個不變當然不能成為解釋其他地區發生變的原因，故各地本土化的訴求，就不適合從西方基督教所提的文明衝突論角度來簡單化。

就以臺灣來說，在地的歷史有自己的脈絡，臺灣目前所碰到種種政治上、文化上或社會上的一些動盪，不能得到很好的整理，多少是由於缺乏連續性的歷史角度與世界性的視野。所謂連續性的歷史角度不是指很長遠的歷史，不必溯自清朝開始，也不必歸源於日本殖民時期，因為這些大歷史都已經是歷史學家研究過的東西<sup>5</sup>。此地的歷史，是指比較近的一段歷史，這段歷史，歷史學家還不到要整理的時候，而一般社會科學家處理的是當代的問題，故又不屬於當代社會科學家要處理的對象，這一段歷史發展的過程，成為在地人今天進行自我認識方面的空白，這段空白大約二十年。

從今天往回推，如果社會科學是以近十年的發展作為它主要內容的話，應該是由1990年往前推二十年的這段時間，可能是各個在地學術界和輿論界都比較忽視的一段當代歷史，因為歷史學家還不到研究這段的時候，社會科學家已經把這段歸檔，以至於今天對很多問題的探討，或會傾向回溯到太深遠的歷史，把歷史看成某種宿命的約束力量，比如認為臺灣經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就必須承認社會上存在一股抗拒中國人或中國文化的不可逃脫的歷史宿命<sup>6</sup>，又比如認為臺灣有長遠的儒家文化根基，就表示不能夠擺脫所謂大陸的文明，必須要回歸文明最早的母體，才能夠掌握

<sup>2</sup> 參考李登輝，*亞洲的智略*（臺北：遠流，民89）。

<sup>3</sup> 例見朱雲漢、王紹光、趙全勝（合編），*華人政治學*（臺北：桂冠，民91）。

<sup>4</sup> 例見李文志、蕭全政（合編），*社會科學在臺灣*（臺北：元照，民91）。

<sup>5</sup> 例見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正中，民89）；李筱峰，*臺灣史100件大事*（臺北：玉山社，民88）；許介麟，*臺灣史記*（臺北：文英堂，民90）。

<sup>6</sup> 參見徐宗懋，*日本情結*（臺北：天下文化，民86）。

方向<sup>7</sup>。這種太深遠的歷史角度，往往會讓當下的人感覺自己其實是像一片枝葉，甚為無力，最後只能選擇落葉歸根。

另一種可能是傾向於現實問題，完全沒有歷史意識，只看今天，如同一般的輿論界或社會科學界，則會讓我們感覺好像未來非常模糊，方向不確定，因為看不到自己從何而來。中間銜接的這一段特別受忽視，關於這一段，一方面要從很遠的歷史往近的歷史看，一方面也必須要從今天在歷史的橫斷面所遭遇到的，包括來自各種世界潮流的衝擊往回看，兩面同時看，才能看到今天很多社會現象的當代的根源何在，作出更為全面的反思。

目前在臺灣社會科學界最受重視的問題之一，是人們政治上的身分，與文化上的自我認同。有關爭議也影響政治領導人在國家定位上的看法，進而對社會大眾提出的發展方向，隨之產生爭議。有的人覺得自己的方向很明確，表現出對自己的身分主張很有決心<sup>8</sup>，其他人有的寧願保持模糊，將模糊視為是一種對身分的抗拒<sup>9</sup>，當然更有的人根本沒有意願探索，覺得這類的澄清不如任其消解才是最好的<sup>10</sup>。至於最流行的口號顯然是本土化。

本土化在當前聽起來雖然是理所當然，好像是每個人都無可質疑的政治主張，可是本土化的內涵卻缺乏共識，於是在政治上最耳熟能詳的表現就是愛臺灣，當政府官員在立法院政策答詢答不出來，有時竟用愛臺灣的口號想交代過去。但沒有什麼問題是透過愛臺灣就可以解決的，事實上，認為自己愛臺灣的人之中可能有作姦犯科的，有殺人放火的，有不知所云的，有懦弱無能的，但他們如果都用愛臺灣來掩飾自己，就把愛臺灣這個立場顛覆掉了，使愛臺灣反而變成一種沒有意義的事，人們為了表現自己的本土性，而一直講愛臺灣，每個人都可以講的結果，反而讓愛臺灣的意義變得很淡薄。為什麼本土化這一個內涵尚未取得共識的概念，在臺灣表述起來能如此理所當然？以下便是對本土的概念在臺灣的當代歷史根源做一個回溯。

## 貳、本土化論述機緣的一次流失

<sup>7</sup> 參見陳孔立，*臺灣史綱要*（北京：九州，1996）。

<sup>8</sup> 參見蕭全政，「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及理論基礎」，*政治科學論叢*（民89年12月）。

<sup>9</sup> 參考趙剛，*小心國家族：批判的社運與社運的批判*（臺市：唐山，民83）；陳光興（編），*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主義*（臺北：巨流，民89）；廖咸浩，「逃離國族：五十年來的臺灣現代詩」*聯合文學*（民83）。

<sup>10</sup> 關於眷村文學的分析就探查到此種筆觸，關於以歷史性的展延來消解身分壓力，參見朱天心，*古都*（臺北：麥田，民86）；以空間性的展延來消解身分壓力，參見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臺北：三三書坊，民79）。

在冷戰開始的時候，也是中國內戰告一段落之際，國民政府於 1949 年播遷臺灣。在那段日子裡，臺灣不存在本土的概念，本土的概念可說是在八〇年代末期才開始比較常用，到九〇年代初期之後，就變得愈來愈流行。所謂本土化，最先是要表達臺灣作為獨立的被人們所思考的對象，或是在臺灣的人思考問題的基礎，即自己是站在臺灣的立場來決策。其中關鍵在於，本土的臺灣是不包含於中國的臺灣，如此講本土才有意義。從 1949 年中國內戰告一段落以來，臺灣的政治領導人並沒有站在中國大陸之外思考臺灣，也沒有這種論述存在，故任何關於臺灣的主張，必須以中國整體的需要來判斷，那麼何以本土化論述後來能發展出來，甚至到今天變得如此理所當然？

一般主張臺灣在政治上應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人，凡事強調本土化，即使臺獨與本土化指涉不同，卻提醒人們，臺灣獨立的主張是本土化的來源之一，所以不能夠否認本土化有歷史上較深遠的根源。領導臺灣獨立運動的人，在知識界主要出於醫、法、農三個專業。蓋早年青年求學過程中，進入這三個介面的，相當程度是來自於，或是承受了日本的菁英文化影響。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只有說日語的小孩將來才方便念大學，當時多半是農或醫。至於法學家，其在日本的社會地位非常高，一般並不接納臺灣的青年，所以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求上進的臺灣青年如果能進大學，許多一心要念法學，所以醫、法、農三個領域和分離主義之間有一定程度的結合，並挹注於本土化運動，確實有比較遠的歷史根源，但這不是以下要談的。

分離主義者是以中國為對象，要求臺灣在政治上脫離中國，以致在思維上有相當程度受中國這個概念所牽制，故並未真正將臺灣視為獨立的個體，也難逕稱之為本土化。那麼，把臺灣當成大陸之外的個體來思索，在當代歷史上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這不一定從本土化作為概念之初開始講起，而可以從其本來可以開始卻沒有開始的時候講起。這裡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紅葉少棒隊。

為什麼紅葉少棒隊有資格成為臺灣本土意識的起源，但是後來並沒有成為一個起源？首先，因為棒球活動不是近代中國自西方所輸入的運動中，最為大家所熟悉的一種運動，但這個運動卻是日本人喜好的運動。所以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發跡，其肇端可以說是根源在中國文化或中國近代史之外的。即使在臺灣，早在紅葉少棒的時代，棒球的確並沒有受到特別重視，是在紅葉少棒打贏了來訪的世界冠軍日本隊之後，臺灣的棒球運動才開始推廣。

而紅葉少棒的成員大多數是布農族的原住民，今天倡言本土化的人都喜歡回溯到原住民，只是那個時代，並沒有人稱原住民是本土。當時布農族被歸為高山族，並不屬於原住民的概念範疇。而紅葉少棒成功之後，又為臺灣的少棒在世界上拿到

冠軍，這個冠軍當然是由最本土的臺灣人在世界上拿到，並不純然是以中國人的姿態出現，甚至還受基督教的影響。當時流行的運動中，籃球隊是由維護反共復國思想的軍中球隊為主力，足球隊則吸收港胞華僑，只有少年棒球隊沒有中華思想或文化的淵源，是臺灣自己地方選出來的，然後代表臺灣出去比賽，獲得勝利。

四大理由讓紅葉少棒隊有資格作為當代本土意識的起源：第一，紅葉是原住民的小孩子；第二，棒球運動不是來自中國文化；第三，棒球運動讓臺灣在世界上有名了；第四，棒球得到民眾普遍的支持，這個支持超越了年齡、階級、原漢、省籍，而成為相互認同的共通符號。隨著棒球運動的發展，臺灣後來有三級棒運，三級棒運之後又有成棒，並終於發展出職業棒球。所以臺灣棒球有這樣的成就，不能夠不回溯往年紅葉少棒的崛起。但紅葉少棒沒有成為本土化的起源，儘管在本土化成為文化運動中的一個概念後，人們曾努力找尋什麼代表臺灣本土，紅葉少棒沒有被提到過，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這也不能逃脫今天的時代背景來分析。

即令今天的棒球運動在出國比賽時，還是一直拿著中華民國國旗，而大陸的棒球運動起步晚，相對比較弱，所以在棒球運動裡面，一直沒有出現大陸會旗與臺灣會旗的爭奪，當與大陸的對立不存在時，政治上的獨立運動不會注意到棒球<sup>11</sup>。因為本土是相對大陸而來，假如在棒球運動不出現中國與臺灣會旗的對立，那就不構成一個本土意識的熱點。甚至在臺灣發生職業棒球員簽賭醜聞後，涉案球員紛紛往大陸發展，成為大陸棒運的中間分子，帶領原本殿後的天津隊屢次問鼎成功，震驚大陸棒壇，則今後就更難讓人將棒球視為是本土化的起源了。

除了當代的原因外還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是紅葉少棒崛起適逢六〇年代末期，當時臺灣的文化復興運動剛剛開展，而文化復興運動的提出，乃是針對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故領導人蔣介石便以文化復興作為對抗。在文化復興與反共的政治大氣候裡，紅葉少棒運動甫發跡，所以在政治上與本土化結合的可能性也不高。故即令棒球運動的發展本身不在中國脈絡之內，但政治背景是非常中國取向的，出去比賽時拿的都是中華民國的旗子，每年到了威廉波特的世界比賽場地，華僑拿的也都是中華民國的旗子。甚至到今天，各地僑胞替到訪代表隊加油，都還習慣拿著中華民國的旗子，所以可見得少棒運動沒有成為本土化根源有其因素，這當然不能稱為是歷史命定的因素。

如果去看那個時候的報紙對臺灣自己的描述，可以發現隨著少棒同時發生的，就是臺灣退出聯合國，接著還有中共與美建交，這樣的遭遇使政治上必須大量進行

<sup>11</sup> 澎湖少棒隊在2002年7月在北京獲得亞洲冠軍，呂秀蓮在7月30日接見他們，特別讚譽，只要打敗北京才是最重要的，並高呼口號臺灣優先。

臺灣化。國民黨不稱臺灣化為本土化，但兩者有其類似性，臺灣化是在政治上大量引入省籍人士，以求在臺灣本地建立統治的正當性，並開始有更多的資源投入臺灣本地的建設。同時，大陸來的老國代既然不足以代表臺灣地區的民眾，所以立法院和國民大會要進行增補選，不過這顯然也不能稱作是本土概念的起源。可是政治發展策略的變遷，卻是某一個意義的起源，亦即一種心理條件的培養，至此承認臺灣在光復大陸、反攻大陸的志業遇到了瓶頸，必須回過頭來扎根臺灣。這樣的思路一旦出現，可以說本土化意識的根苗便有機會萌發。可是真正讓臺灣與大陸變成分開，在世界上變成單獨的個體，可能要到越戰結束之後，而且這股力量初始也不完全來自於臺灣的本身，而來自於整個世界格局的轉變。

### 參、本土化論述主體的浮現

越戰結束後，北越已將南越統一，美軍戰敗，七〇年代中期之後撤出越南。從冷戰的角度來看，或從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戰略看，越戰的結束可說是美國圍堵政策失敗的宣告。美國作為世界的主要統治者，必須要透過某種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來鞏固美國人的自信心，與美國對世界格局繼續介入的正當性。此一維繫其霸業的世界觀如果成功，甚至還可以讓人們感覺到美國沒有戰敗。恰在七〇年代中期，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大量資助福特基金會與其他基金會，在學術界開始營造一種新的問題意識。過去學術界，特別是研究戰略、政治、國際關係的學者所研究的問題，在於如何圍堵共產集團，如今圍堵線出現大漏洞，而且美國的圍堵又失敗了，在這樣的時局發展之下，美國人要如何面對圍堵失敗的世界？

CIA 拿出很大一筆錢由福特基金會散布出去，提出一個新的研究範疇，叫太平洋盆地（Pacific Rim）<sup>12</sup>。這個舊概念的重新推廣非常有創意，其投資的高峰，是在大學學院裡成立專門研究太平洋盆地的學校，位於加州大學的聖地牙哥分校內，乃今天赫赫有名的國際事務與太平洋盆地學院，包括前此鋒頭頗健的國務院專門負責東亞國際事務的謝淑麗（Susan Shirk），就是在此學院教書。而早年提出革命理論，而且後來成為中國研究專家，並在日本研究中提出著名發展理論的 Chalmers Johnson，也在這個機構。更不用提的是，美國八〇年代崛起的新星，專門研究臺灣模式的學者 Stephen Hagger，就在這個機構取得終身教。

透過 CIA 的努力與基金會的白手套，Pacific Rim 的概念提了出來，而且成立了

<sup>12</sup> 參見 Bruce Cum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1 (Jan-Mar 1997): 6-27.

Pacific Rim Study 這樣的研究議程，對之後世界的認識起了很大的衝擊，尤其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漣漪。在太平洋盆地的概念裡，越南所要相互比較的國家群體，與冷戰時期的北越所要比較的國家群體，屬於兩件完全不同的思維工程。在冷戰時期，北越是和南越作比較，因為共產集團當然是和自由主義陣營作比較；但在太平洋盆地的概念裡，統一之後的越南既是屬於太平洋盆地的一國，於是和越南比較的國家不再是南越，因為它已經不存在了，所以就必須和臺灣、日本、韓國、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攀比。於是乎，太平洋盆地的概念一提出來，北越從本來是個打勝的國家，竟馬上變成一個失敗的國家，因為和它比的這些國家，都是在資本主義概念裡成功的國家，像今天耳熟能詳的四小龍，再加上日本，無形中越南就突然淪為一個失敗國家。

臺灣則變成四小龍之一，Stephen Hagger 這些學者後來發展出來一個新名詞 NICs（即新興工業化國家）<sup>13</sup>，影射了其他不是 NICs 的就是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其中明顯的轉變，就是臺灣變成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楷模。當時全世界幾乎都反美，即使美國的拳擊手和共產主義的古巴比賽，通常全場的拉丁美洲選手和觀眾都是幫古巴加油，之前著名的非洲研究機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院，招收大量的非洲學生，他們無不努力對於美國採取有組織、有系統、有理論的批判，可見美國在非洲是極度不受歡迎的。可以說全世界對美國最歡迎的，大概就是中國人了，這包括大陸上的中國人與臺灣人。

中國人在文革之後都還一面倒的傾向美國，美國在大陸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轉壞，恐怕還是在八九天安門民運之後。長久以來，在近代史上中國人對美國留有非常好的印象。鴉片戰爭時美國沒有打來，後來收了很多華工到美國（當然虐待華工與華妓是另外一回事），辛丑和約又把清廷的賠款用於中國的留學生。所以後來宋美齡到美國演講，曾指出中國人把最好的字，就是「美」，給了美國<sup>14</sup>，而且，中國派駐世界的第一個大使就是美國人，蒲安臣（1867 年代表清廷出使美、英、法、俄、普魯士等國），足見中國人對美國的印象一直很好。

七〇年代末期，當包括韓國在內的全世界情緒上都在反美，只有臺灣沒有反對美國。太平洋盆地的概念提出之後，臺灣作為接受美援國家在世界上發展的一個楷模，其地位就奠定下來了。臺灣作為楷模在七〇年代末期，並不是對著中國大陸講，而是對著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國家講，這是一個本土化的契機，因為臺灣在不需

<sup>13</sup> 例見 Stephe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sup>14</sup> 參見宋美齡在 1943 年 2 月 28 日參議院演講內容。

要與中國大陸對比的前提下，以自身的發展成為社會科學的對象。

拉丁美洲與非洲地區知識分子之間，在五〇年代末期提出了一個依賴理論，他們批評來自美國的資本在表面上雖然投資到開發中國家，其實對這些國家造成兩個非常大的影響，一個影響就是使這個國家分裂成兩極社會，一極是在鄉下靠著農村勞力活動自給自足地生存，另外一極就是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都市裡的人是靠著剝削勞工而發達，健康的勞工都是從鄉下的自給自足體系裡源源不絕提供而來。勞力必須進城市，是因為政府要收稅，鄉下人沒有貨幣，只好出來工作，才能夠換取微薄薪資繳稅給政府，於是外來的美國資本家就有大量的勞工待僱。第二個效果，是因為接受投資的國家大量仰賴美國資本，極少數上層階級賺了錢之後，向美國購買消費奢侈品，造成外匯大量的流失，因此不斷地要靠美國資本的挹注，不然外匯就不平衡，匯率大幅貶值，將在進口機器時受到影響。如果機器不能進口的話，國內勞工就不能再繼續僱用下去，如此造成失業，既然大批勞工都已經到了城市裡，可能會發動工運，政府只好靠美國人支持當地軍事強人來鎮壓，也就是美國人的資本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之後，逐步使得這些新興國家完全沒有任何選擇地必須要依賴美國政府，沒有美國政府，當地政府就垮了，政府一垮，社會接著潰散，此之謂依賴理論。

這個理論後來很風行，美國有很多學者撰文和依賴理論家進行辯論。這已經不完全是學術辯論，因為依賴理論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知識分子看待美國的態度，所以除了是一個學術上的理論以外，也有效地反映了第三世界的知識立場，對美國社會科學界造成很大的震撼。

在這樣的震撼之下，美國知識界很高興看到在東亞有韓國、臺灣這些個國家，證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可以成功的。東亞國家可以一方面成功地經濟成長，另一方面，社會的貧富不均也能夠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下，並不會因為經濟的成長與大量外資的進入，就造成社會上的階層分化，九〇年代以前的臺灣成為非常好的例子。韓國照理也是個很好的例子，不過韓國民族主義情緒很強，既反日又反美。所以臺灣變成是美國人的世界局勢裡最可以疼惜的對象。適逢一個大的論述背景與世界格局改變，以及依賴理論蓬勃發展的挑戰之下，透過美國最高的情報單位與各個基金會，拿出一大筆錢來，大量聘僱學校教授、成立學院，提出各種各樣的研究計畫，帶動整個風潮，重新對世界進行理解。就是在太平洋盆地的概念之下，臺灣才堂堂正正地走出中國這個區域，讓自己變成在世界上被認可的獨立單位。

在臺灣的本土化論述氾濫之前，這個發展是非常關鍵的一個點。與紅葉少棒比起來，也許還是紅葉少棒比較像本土化的源起，可是讓人們真正在概念上從中國大

陸以外來認識自己世界地位的，還是與越戰結束，美國世界觀從圍堵轉移成太平洋盆地的概念，更為息息相關。

## 肆、本土化論述對象的浮現

七〇年代末期之後，臺灣即開始宣傳，認為自己是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楷模，無獨有偶地，大陸在七〇年代中期文革結束以後，對自己的認識也開始進行反省。1974年，大陸當時領導人毛澤東派鄧小平到聯合國提出一個新的理論，說明大陸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首先，這個新理論要能繼承文化大革命。文革是毛澤東一路領導而來，但推動到六九年之後就不是那麼順利了，所以七〇年之後發生解放軍大量屠殺學生的事。一般研究文革的人都認為文革高潮到六九年結束，而沒有注意到，可能1970年之後的一年，才是真正鎮壓的時間，這可以看到他要重新整頓，把文革停止，並震懾住紅衛兵，將造反派除掉，所以才發生這些血腥的鎮壓。大陸在當時也在重新思索如何替自己在世界上定位。

1966年以來，文化大革命鼓吹世界革命，紅衛兵騷擾世界各地駐中國大使館，並把中國駐各國的大使全部召回，以及發動各種各樣世界革命式的騷擾。1969年中共與蘇聯發生衝突，是為珍寶島事件。幾乎同一時間，美軍升高在越南的介入，該年四月，林彪竟在中共九大上侃侃而談，說世界上唯一能夠與美、蘇兩大超強抗衡，而且被兩大超強南北包圍的，就只有中國，所以中國才是真正在推動世界革命，言談之中還有某種自得，畢竟中國是唯一與世界兩大超強同時作戰的國家<sup>15</sup>。但是，顯然國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打、砸、搶的認識當中統治下去，所以國家必須收權，收了之後必須說明如何重新認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於是需要設想一套理論，讓文化大革命的氣息可以延續。

但另一方面國內的革命則理所當然地終止，但不能給人一種虎頭蛇尾，或是狗尾續貂的印象。於是在1974年，鄧小平衛毛澤東之命到聯合國開會時，就正式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把世界分成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所謂第一世界當然就是美、蘇兩大超強；至於第二世界指的是依附於兩大超強的主要為歐洲國家，再加上澳洲、紐西蘭、日本這些比較先進的國家；最後就是從五〇年代開始，中共大呼要團結的亞、非、拉為第三世界國家。毛澤東宣告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在臺灣很多研究中共外交的人常常宣傳，中共乃以第三世界領導自居，但如果去看中

<sup>15</sup> 匪俄鬥爭原始資料彙編（臺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60），頁27-28。

共外交相關的學術界作品，或教科書，或外交領導人講的話，從來沒有講過要以第三世界領導自居，而一向只說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因為，毛澤東曾說，中國不搞大國主義，以及中國不搞霸權，中國將來興盛了之後不會這樣或那樣<sup>16</sup>。

因此，中共外交界的人很有意識地克制不用第三世界領導這樣的詞彙，而總是不斷地重複中國屬於第三世界。1974年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後，中共進一步想擴大和第三世界的關係，以便來對抗美國和蘇聯兩大超強的包圍，1969年中共和蘇聯在珍寶島起了武裝衝突，使得中國在外交戰略上感受到一種壓力，要以與美國一定程度的靠近姿態牽制蘇聯。但是毛澤東從來沒有主動去靠近美國，而是美國尼克森總統為了結束越戰，牽制蘇聯，而主動靠近毛澤東。所以1972年尼克森訪華的時候，毛澤東的感覺可能有些尷尬的，一方面他很高興敵對陣營的領導國家終於讓步認可中共，中國在七〇年代初期進入聯合國，把臺灣趕走。但在1972年美國帝國主義頭子尼克森訪華，要與這些帝國主義握手，仍很難讓人不心起疑竇，到底世界革命還要不要搞。所以尼克森到訪之前，報上還很多批判美帝的文宣，尼克森走了之後又出現批判美帝，唯有尼克森來訪期間，報紙上沒有批判美帝。但是有一點很有趣，就是毛澤東接見過尼克森之後就消失了，報紙上所有有關尼克森的報導都是與周恩來在一起，報紙上凡是有毛澤東的報導，都是有關他在農村，好像尼克森來對他而言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從這裡可以看出來，在論述上與意識形態上，他似乎想要圓說自己與美國人接近，來對付蘇聯這件事，不是背叛了反帝路線。

第三世界理論提出來之後，他就為中國在理論上找到了一個位置，這個位置容許中國可以與美、蘇兩大超強作各種各樣的合縱連橫，不失去中國自己有別於美、蘇兩大超強，而不同其中任何一強結盟的立場。毛澤東不但害怕別人覺得中國在試圖與美國結盟，他自己恐怕都很不能忍受中國與美國結盟。

第三世界理論的提出，與臺灣變成第三世界楷模，在時間上的差距也不過是三到五年。1974年以後，為了實踐三個世界的理論，所以大陸領導人大量地往世界各地走，發動新一波第三世界外交，並推銷三個世界理論，也推銷地相當成功，不論在聯合國，或是在今天的學術界，不斷地仍然在用第三世界闡述開發中國家的地位。而臺灣也是在七〇年代末期變成第三世界國家的楷模。現在臺灣和大陸在第三世界的爭鬥，其意義就不再是誰代表中國的爭鬥。本來雙方是爭奪誰代表中國，這個戰役的勝負在臺灣退出聯合國之後已經決定了。雙方鬥爭的新意義是，誰的發展模式才是適合第三世界國家的楷模，臺灣很明顯地就是代表美國觀點，最終歷史目標是

<sup>16</sup> 毛澤東，論統一戰線（北京：中國文獻與歷史出版社，1987），頁346。

以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為號召的發展模式；而大陸的發展模式當然就是社會主義路線，或中央計畫的發展模式。

在這一連串競爭的同時，世界局勢的發展並不在臺灣的掌控之中，1976年，毛澤東死亡，發生四人幫事件，過了兩年的摸索後，1978年底農村開始承包制的改革，1984年開始推動城市改革，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大陸上的改革開放變成潮流。同樣在八〇年代中期，大陸的外交界為能順應改革開放，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這個新概念到現在大陸的外交界還在用，叫做和平與發展。八〇年代中期也是大陸改革從農村往都市走的時候，1984年提出城市改革，之後才有開放這個詞。早期改革的不叫改革開放，而叫做四個現代化，到了八〇年代中期才有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概念和外交上和平與發展的概念幾乎是同時提出來的。

可以看到，大陸和臺灣本來是爭奪中國代表權，到了七〇年代末轉變成爭奪誰是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楷模，八〇年代以降大陸內部的發展等於宣告社會主義路線失敗，最初中共宣傳中央計畫才是最好的，後來說革命是最好的，後來再又改口說自力更生是最好的，每一階段都在告訴第三世界甚麼是最好的發展模式，想把中國的經驗和非洲的經驗結合輸出。一直有很多非洲的學生到大陸去唸書，學習怎麼革命，怎麼發展，怎麼計畫經濟。結果中共自己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很顯然中共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楷模的地位，因為大陸自己內部的因素受到撞擊，於是臺灣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楷模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了。

在美國的學術界，八〇年代末期以後，臺灣學變成是一個顯學，不論是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關於臺灣的博士論文，在八〇年代末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不但是政治界為了世界霸權的需要，連學術界在概念上都開始把臺灣視為是特殊發展的楷模來研究，把臺灣和韓國、墨西哥作比較之類的論文非常多，在臺灣的人或許覺得很奇怪，自己會和墨西哥作比較？這是美國學界和依賴理論辯論的結果，因為墨西哥是被當成依賴理論的典型，故拿臺灣和墨西哥作比較，比較之後才可以判斷哪一個發展是歷史必然的進程，在這個進程過程中誰犯了錯，此地隱含的前提當然是墨西哥犯了錯，八〇年代末期這類的博士論文多如過江之鯽，臺灣出去的留學生，以政治學為例，幾乎很難逃避要寫臺灣的民主化或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因為連美國老師都很期待臺灣學生寫這個題目。在那個時期翻閱博士論文清單，每一學年有十篇以上寫臺灣經驗，近十年回來教書的政治學老師，博士論文絕大部分是在寫臺灣，寫中國大陸的相形見绌。

## 伍、本土化論述的本土脈絡

本土化論述的萌芽，在同一時期的臺灣也有內在的因素。早年國民黨的統治引起自由主義的反彈。自由主義是很西方的概念，在國民黨依附美國的冷戰時期，以自由主義之名抗拒一黨統治有其策略上的自然性。另一方面，在反共復國的訴求中，國民黨以自由陣營一分子自居，對抗所謂極權統治的中共，因此訴求於自由主義抗拒國民黨，使國民黨在維持自己正當性的需求下，投鼠忌器，不敢採取毀滅性的手段。國民黨引起抗拒其實與基層的腐化有關，故各地冒出來挑戰的人多數來自國民黨內部，因為對於黨機器分配資源與職位缺乏公平正義，而號召群眾支持，藉由政治臺灣化的進程，在各地方基層紛紛冒出頭。這是為什麼早年反對運動中勝出者之間，並無組織，部分說明後來民主進步黨的山頭主義，因為其前身黨外，就是在各地反抗國民黨腐化過程中，各自出現的前國民黨基層脫離勢力。在之後採取組織化的努力中，本土化成為一個可以整合山頭勢力的共同訴求，但因為李登輝執政後也以本土化為號召，不僅在與國民黨舊勢力鬥爭中，獲得民進黨各山頭的支持，也使民進黨的執政延遲至李登輝卸任之後。

九〇年往回推二十年的歷史發展，事後看起來應當是能讓臺灣成為中國之外獨立個體的重要根源，且被世人以及被生活在臺灣的人自己看成是中國之外的。當然，在這個根源逐漸茁長之後，臺灣內部的發展有所配合已如前述。世界格局變動所帶動的臺灣定位調整，可以作為本土的起源，這個本土的根苗為今天政治學界所忽略。

回顧文明衝突的理論，Huntington 並沒有深入各地的歷史脈絡，他便很難掌握所謂本土化成為潮流的複雜因子。本土化發生在臺灣，是在文明衝突作為論述之前，可見在邏輯上本土化的概念未必依附在文明衝突之下。本土化的觀念也出現於臺灣社會科學界對方法論進行反思之前，則又可見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其政治社會的背景，社會科學的本土化本身不能視之為中立的學術主張。又由於本土化的訴求沒有溯及紅葉少棒隊，表示本土化的緣起同時有巧合與意識兩方面的原因。這兩方面的原因不同於較長遠的歷史結構，也不同於因應當代局勢的政治需要而已。